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2.022

■ 语言研究

关联顺应视阈下跨文化交际意图的动态激活^①

旷 战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在简要介绍关联顺应理论、跨文化交际意图及其特点之后,指出跨文化交际意图的动态激活离不开交际双方的合作顺应、示意推理、相关参项语境要素的认知建构以及文化图示的不断动态拓展延伸;最后尝试建构此类交际意图动态激活的分析模式。

关键词:关联顺应;跨文化交际意图;动态激活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2-0128-05

Dynamic Activ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and Adaptation

KUANG Zh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China 411201)

Abstract: After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relevance and adaptation theor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at the dynamic activ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is based on such factors as mutual cooperation and adaptation,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ostensive-inferential model, the recongnitive construction of related contextual factors, and the dynamic expansion and extention of communicator's cultural schema. It also attempts to build up the pragmatic analytic model of dynamic activ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Key words: relevance and adapt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dynamic activation

交际意图是哲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中所涉及的概念,先后有语言学家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多维探讨和研究。国外学者主要涉及到指称论和观念论、形式主义语义学及语用学意义理论这三个方面,代表人物分别为 Grice^[1]、Austin^{[2]147}、Levinson^{[3]15-30}等人。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集中于相同文化背景下交际意图与语篇理解及其认知范畴与语境要素之间的关系,主要有王传经^[4]、方直^[5]、林波^[6]等人。但迄今为止,对于跨文化背景下的交际意图及其特点,交际主体的能动性与客体内容的文化规约性如何相互作用,交际意图动态认知激活需要交际者之间遵循什么原则来进行不同程度的文化调试等问题,国内外学者均未曾涉及。本文立足于前人研究,以关联顺应等语用学理论为主要导向,在跨文化言语交际的视角下对这几个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① 收稿日期:2013-10-18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13C297)

作者简介:旷战(1973-),男,湖南湘潭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研究。

一 关联顺应理论

Sperber 和 Wilson^{[7]38-60}的关联理论从认知心理角度提出语言交际是一种受关联原则支配的示意-推理交际,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是存于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它由词汇信息、逻辑信息和百科信息组成^[8]。关联理论强调交际者在社会和情感两方面心理上的认知,在此基础上通过演绎推理获取最佳关联,话语是否具备关联性可通过推理所获得的语境效果来判断。语境效果与关联性成正比,与推理努力成反比。

Verscheuren^{[9]58-143}的顺应理论则认为语言的使用即语言的选择,使用者能够进行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顺应性、商讨性、变异性,这三个基本特性使人类得以动态地使用语言。语言的选择过程也是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相互动态顺应的过程。顺应性主要包括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中的意识突显等方面。其中的语境包括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前者指交际者根据语境因素选择的各种语言手段;后者则由语言使用者、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及心理世界组成,交际双方的意图属交际语境。

从关联顺应视角探讨跨文化交际意图的动态认知激活,即强调了语言的认知关联功能以及与语境的相互动态顺应,又让关联理论解释的充分性和顺应理论的描述充分性得到很好的契合。

二 跨文化交际意图的内涵

随着国际上多领域多层次交流的日益频繁,语言的工具性用途也愈显重要。而在跨文化交际中,话语意义的认知理解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心理过程,成功的交际离不开交际双方对话语意图的有效的表达、传递和辨识。

意图(intention)包含信息意图(使对方明白或者更加明白的一组假设)和交际意图(使交际双方互明说话人具有的某种信息意图)。作为影响交际的关键要素,意图既是交际过程的起点,又是相关信息经认知推理后的终端。意图的产生是因为大脑接受到某种刺激源——刚收到的新信息,而这些新信息或源于交际者内部机制,如情感因素、精神需要和生理变化等等;或来自外部环境,如交际对方的言行以及其他相关语境的触发因素^[10]。

顾名思义,跨文化交际意图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所预设的某种言语行为指向^[11]。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言语行为的动态变化尤为突出,交际意图的激活经常受到两种或以上不同文化的干扰,从而使得交际意图愈加内隐模糊。伴随着语言的不确定性和认知的模糊性,推导中的意图往往呈现出认知上的应变性与内容的不可协调性以及多态化、动态化、复杂化、隐蔽性等特点。交际者必需运用跨文化语境的诸多要素进行关联假设和动态推导,寻求交际意图与语境之间的关联与顺应,获得最佳语境效果,进而确定说话者的真值意图。

三 跨文化交际意图的动态认知激活

跨文化交际意图动态激活的错综复杂不是源于语言本身,而是来自语言的具体运用,它涉及到交际双方合作顺应的基础上示意推理模式的应用、语境要素的认知激活、以及文化图示的不断动态拓展延伸等等。

(一) 交际双方的合作顺应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要使交际成功,交际者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或者至少有一个被双方或多方都接受的大方向。这个目标或方向常常在谈话的一开始就明确,也可能在交谈过程中产生。美国哲学家 Grice 也认为,言语交际中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交际双方之间存在一种默契,一种都应该遵守的原则,从而使交际者所说的话符合交际公认目的或方向,这便是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12]153-155}。当然,有时人们也会因种种原因而不愿继续交谈,从而出现答非所问最终导致交际中断的情况,不过,这毕竟是少数情况。例如:

(1) A: Where's Jim?

B: There's a yellow BMW outside Sue's house.

在这个对话里,如果交际双方都遵守合作原则,那么A会很自然地在自己的问题和B的回答之间去建立联系,基于他们共享的常识或一般常识:Jim有一辆黄色的BMW,到别人家去一般总把车停在那家门前,他就能很快认知激活B的交际意图—Jim在Sue家里。

当然,除了合作原则的遵守,交际双方的语言顺应也必不可少。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就必须对语言进行选择,就语言的各个层次的结构作出顺应以及对这些结构选择什么样的构建原则。语言结构的顺应应从多方面对语言作出选择:选择语言、语码和语体,选择话语的构建原则;此外,交际者还要根据双方的语言能力和爱好选择恰当的语言符号进行交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语言使用和顺应还会受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和语言态度等因素的制约,而语言语码的转换与区域变体、社会变体、功能变体以及不同语体的存在,也都影响到语言的选择。

在跨文化交际意图认知激活过程中,交际主体与客体、目的语文化与源语文化规约性以及跨文化交际语境之间必然经历选择、冲突、磋商、调适等过程,这就更需要交际主体在合作顺应的基础上,彼此能动地识辨来推进。

(二) 示意—推理模式的应用

自索绪尔开创符号学以来,语码模式就长期在交际理论中占统治地位,但对具有文化内涵的言语交际,编码和解码的解释就显得苍白乏力;而Grice的推理模式对交际的诠释又略显不足。Sperber和Wilson结合两种模式的特点,提出了示意—推理交际模式,弥补上述的不足。

示意是对听话人而言,指的是说话人发出一种刺激信号,使之对交际双方互相显映(Mutually manifest),其目的在于向听话人显映或更加清楚地显映一系列的命题,明确地表示意图;如果听话人能明白说话人所作的示意行为,那么这种示意行为就是显映的。示意行为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推理是对说话人而言,听话人凭借说话人所提供的显映方式进行解码,并将解码所得到的证据作为前提的一部分,再结合本身的认知语境对话语信息按一定的方向进行推理,最终认知激活对方话语信息的真值意图。

然而,交际者不仅会直接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意图,他们也经常间接地传达自己的意图,以期听话人能够利用相关语境要素,通过推理得出交际者传达的交际意图。因此,交际者的交际意图常常与他提供的话语信息不相一致,甚至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听话人就需要越过字面意思,结合相关语境信息,通过正确推理把握说话人的意图。例如:

(2)A: Where does Sarah live?

B: Somewhere in the suburbs of the city.

通常情况下,B的回答至少可有两种不同的意图解读:(1)确实不知道住处;(2)知道住处却不想告诉。而B的真实的话语意义却只有一个,在合作顺应的基础上,A凭说话人的显映方式进行解码,并将解码所得到的证据作为前提部分,再结合跨文化交际语境对话语信息按相关的方向进行推理,在其大脑所形成的关于一个命题的多个映射,并结合当时的语境假设去一一排除,就能选择最具体适合语境的语用意义来阐释对方的交际意图。

(三) 语境要素的认知激活

由于交际过程与环境的复杂性,跨文化交际意图作为一种重要的语境因素,往往呈现多态化。此时交际双方就要在语境的诸多要素进行语境假设和顺应动态推理,寻求交际意图、话语、语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关联顺应,取得最佳语境效果,最终激活对方交际意图的真值命题。

按照语境要素充当的功能,跨文化交际中的语境可划分为语言语境、文化语境、交际语境、心理语境等宏观层面。而宏观层面又包含各种微观层面的语境。微观层面的语境既可单独对言语发生作用,又与其他微观语境彼此相互作用,形成大、中、小语境的层层联系。它不像同源文化交际中所涉及的具体参项文化语境那样固定和系统化,而是对参项语境要素在关联顺应性这一契合点上的认知激活^[13]。

与此同时交际者也在不断地选择、控制、变换、整合着不同的语境要素,不断做出一定的文化调适,在话语中寻找最佳关联,顺应着语境的外显和内化因素以便为交际意图的认知激活更好地服务。例如A(中国人)与B(美国人)在闲聊:

(3)A: The hostess is an awful bore, don't you think?

B: The roses are lovely, aren't they?

表面上B的回答“玫瑰花很可爱,难道不是吗”似乎令人很茫然,实际上B的回答同时操纵了若干个语境要素:其一为语言语境,B表面不相干的回答暗含了B的某种态度;其二为交际语境,共享知识背景表明他们都认识这个女主人;其三为逻辑语境,B有意这样回答,他很有可能具有某种目的;其四为文化语境,B所处的文化氛围不允许他这样说;其五为认知语境,B有意这样回答,肯定顺应对话并与之关联。A在不断的推理过程中如果通过至少这五层语境要素的协同干涉和动态组合,从而建立起相应的跨文化交际语境,那么B的交际意图最终也就不言自明。

(四)文化图示的拓展延伸

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以图式的形式贮存记忆,图式是认知框架,更是人们认识和了解世界的基础。言语理解是一个动态交互的过程,外界输入的新信息同大脑中的图式顺应联系起来时产生共鸣,从而达到理解新知识目的。

文化图式则指的是人脑通过先前的经验已经存在的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结构块”,它可用来感知、理解和诠释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14]。然而在现实当中,由于交际双方文化图示的差异性和不对称,话语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大不相同,双方输入的言语信号激活不了应激活的认知空位,因而激活不了比较完整的文化图式,有时甚至记忆里根本就没有相关的文化图式备用,从而无法认知激活对方的交际意图,最终导致理解的障碍和失败。例如:

(4)A: Tim, you don't read, do you?

B: Me? No, I am a tube freak.

Tube的本意在美国俚语中指得是电视迷的意思,但是在这段对话中,由于交际双方社会文化的差异,相同的文字信息所激活的内容图式也就不同,就会引起信息差,造成A对tube言语理解的信息不等值现象,从而无法推断出B话语的真实意图。

话语语篇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为其理解创建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交际双方克服文化思维定势和偏见,尽量在大脑中建立并充分调动尽可能多的文化图式,有效地进行文化图式的拓展与延伸,调整和构建,对带有彼此文化烙印的话语语篇进行创造性的理解,才能更好认知激活交际意图。此外,交际双方还可以从先前话语中寻找相关假设,从当前交际情境中提取相关信息,从存储或正被处理的话语所传达的假设中出现的概念之下的百科词条来补充处理话语所需的语境^[15]。总之,人们的跨文化背景知识越丰富,头脑中建立的关联图式越多,解读对方的交际意图也就越快越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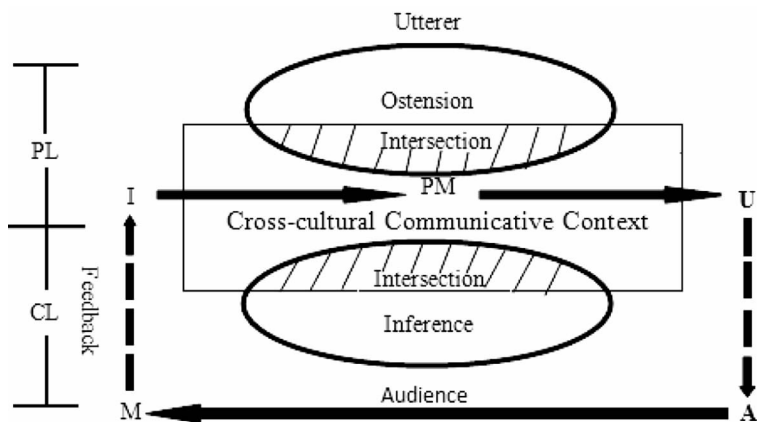
(五)跨文化交际意图认知激活示意图

基于上述探讨,我们不妨对跨文化交际意图认知激活模式作如下简易图示(如图1^[16]所示):

说话人(utterer)形成交际意图I后,经过概念化的认知过程,将意图顺应转化为预设意义PM;而后通过建构跨文化语境,采取示意的方式,发出话语U或行为,将预设意义传递到听话人(audience)的大脑中,以引导其从正确的方向进行推导。听话人接收话语或行为刺激信号后,通过认知逻辑机制和文化图示对新的相关信息形成一系列的假设A,并不断进行加工分析选择,以建构合适的跨文化语境来激活交际意图,而后遵循最佳关联和顺应原则进行非论证性推理,逆导出对说话人意图的最佳阐释,赋予话语或行为以含义M;最后通过听话人的信息反馈来验证假设意图的正确与否,图中过程用实线表示;虚线为映射关系。该过程模式表明,无论是说话人在语用层面(PL)上对意图的传递,还是听话人对意图的选择和阐释,都离不开认知层面(CL)的信息加工。

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际双方的文化图式和认知语境呈不对称性,导致无法激活真值交际意图,

交际会暂告失败;此时需要交际者重新调整语用策略,有效地拓展与延伸文化图式,对跨文化语境进行重新构建。



(注: PL: pragmatic layer; CL: cognitive layer; I: intention; PM: presumptive meaning; U: utterance; A: assumption; M: meaning).

图1 跨文化交际意图认知激活示意图

四 结 语

本文以关联-顺应等语用理论为主要导向,从跨文化角度研究言语交际中意图的动态认知激活;并以此为切入点,凸显交际主体的合作顺应的能动性、语境要素的认知关联的动态性、示意-推理模式运用的灵活性以及文化图式在交际意图的认知推理中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了跨文化交际意图认知激活分析模式。研究表明,探讨交际意图的动态认知激活的过程为交际意图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有利于加深语言学习者、教学者等对交际意图及其社会文化内涵的了解,提高跨文化交际语用能力^[17];更有利于揭示话语发生和发展的内在和外在机制和规律,促进语言应用乃至语用学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Grice H P. Meaning [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7, 66 (3): 377 - 388.
- [2]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M].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2.
- [3] Levinson S C. Pragma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4] 王传经. 交际意图与英语教学[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3(3): 30 - 35.
- [5] 方直. 交际意图与话语之间的关联性[J]. 山东外语教学, 1998(3): 17 - 20.
- [6] 林波. 交际意图的语用认知新探[J]. 外语教学, 2002(3): 27 - 33.
- [7]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Wiley - Blackwell, 1986.
- [8] 卜杰民. 关联-顺应语用模式的研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3): 136 - 140.
- [9] Verschuren, Jef.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 2000.
- [10] 旷战. 会话含义推理中交际意图的动态识别[J]. 陇东学院报, 2010(2): 100 - 102.
- [11] 肖乐. 跨文化交际视阈下的旅游文化传播[J]. 湖南社会科学, 2012(6): 182 - 184.
- [12] 何兆熊. 语用学概要[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13] 旷战. 关联顺应与跨文化交际语境的动态建构[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2): 365 - 366.
- [14] 刘明东. 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J]. 中国翻译, 2003(2): 30 - 33.
- [15] 何自然, 陈新仁. 当代语用学[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 [16] 宋德生, 宋潇潇. 认知语境参与下的交际意图的实现及其模式[J]. 云梦学刊, 2008(6): 137 - 140.
- [17] 成雪梅. 语境渗透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J]. 外国语文, 2012(5): 146 - 150.